

隋唐长安城规划主题

——皇权永祚的龟鼎之城

杨鸿勋

提 要：关于唐长安前身——隋大兴城的规划思想，以前很少谈论。其实隋宇文恺规划设计首都大兴城，除了按照传统体现天子尊贵的“九五”数字外，并创造性地在都城平面图中暗含若干代表鼎足的等边三角形，用以体现“定鼎”——掌握政权之意。同时，在都城中轴线南端——明德门外，埋置石龟，与鼎足结合表明“皇权永祚”。

关键词：大兴 宇文恺 等边三角形 龟鼎 皇权永祚

The Principal Idea of the Design of Sui-Tang Chang' an City: A City of Turtle Top Representing the Blessing of Imperial Power
Yang Hongxun

Abstract: There have been few discussions about the designing idea of the Daxing City of the Sui Dynasty - predecessor of the Chang' an City of the Tang Dynasty. In fact, the Daxing City, designed by Yuwen Kai,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numbers of Nine and Five, a symbolic manifestation of the emperor' s extreme sovereign, but also entails some equilateral triangles, which represent the acquisition of power - dingding (placing a weighty vessel with three legs) . Meanwhile, a stone turtle is buried outside the south end of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city. The stone turtle, combined with dingding, show the everlasting blessing of imperial power.

Keywords: Daxing, Yuwen Kai, Equilateral Triangle, Turtle Top, Blessing of Imperial Power

中图分类号：Tu-098.6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674-9677 (2014) 02-0049-04

引 言

唐都长安城是隋都大兴城的延续，隋朝国祚短促，这座划时代的都城作为国祚长久的盛唐都城“长安”而闻名天下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之后的第二次大统一的隋朝开国皇帝——隋文帝杨坚，认为北周所沿用的汉长安城破旧，而且地域狭隘，没有发展的余地，又常有渭河洪水的灾害，城市来自地下的生活水源已经发生盐卤，不堪饮用，必须另建一座与统一大帝国相称的新都城。隋建国伊始，于隋开皇二年（582年）六月，隋文帝杨坚亲自部署勘察选址，在汉长安城东南、现今西安市一带察看形势，同时遵照堪舆“谋筮从龟，瞻星揆日”，他在营建新都诏书中说：此地“龙首山川原秀丽，弃物滋阜，卜食相土，宜建都邑。定鼎之基永固，无穷之业在斯”。

隋文帝杨坚命左仆射高颎为总裁、太子左庶子宇文恺“创制”——主持规划设计；将作大匠刘龙、工部尚书贺娄子干、太府少卿高龙义等指挥监督建设施工。由于宇文恺幼时就跟随在北魏和北周

担任重臣的父亲宇文贵，住在洛阳和邺南城；及长，对洛阳和邺南城的城市和宫殿都有所了解。而高颎、刘龙、高龙义等又都是北齐的宗室或遗臣，即所有参与领导和主持大兴规划建设工作的这几个人，都是熟悉北魏、北齐都城与宫殿制度的。所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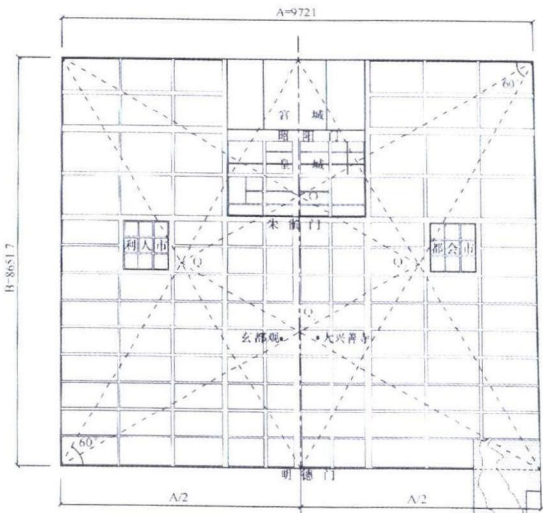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隋大兴郭城内含等边三角形
(摘自《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》)

在大兴规划中,对北魏洛阳与北齐邺南城有所借鉴,是必然的。陈寅恪说得对:“隋创新都,其市、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,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、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,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之一端”;“隋代大兴城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,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,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”。^①

伟大的唐长安,是隋朝伟大的建筑家宇文恺的作品。作为建筑师,他在体现“业主”皇帝意图的前提下,有着巨大的发挥创造。

隋大兴城规划的指导思想,首先是与地理形势相融合的规划——赋予地理形势六坡以“六爻”的寓意。再就是作为统一帝国的都城,必须按照儒家“从周”的原则,以《周礼·考工记》关于周王都城形制为基础,根据当时的条件有选择地采取以宫城为主体,加以变通。保持“面朝”——中央衙署位于宫城之南;“左祖右社”——在宫城前面的皇城内,左前方布置供奉祖宗的太庙,在右前方并列社稷二坛,祭祀土地神祇的太(大)社在东、祭祀五谷神祇的太稷在西,皆北向的变通处理。“旁三门”——在郭城东、西、南三面各设三门;街道“九经”——设置纵向大道九条等。大兴规划既有原则,又灵活变通,宫城不按照周王宫设在城中南部,而是按照建设地段的地理形势,宫城与皇城安排在最高的北部。宫城背靠龙首原禁苑,利于安全防卫。在建筑艺术上,居高临下俯视全城的气势,以及高高在上“北阙连天顶”、“参差宫殿接云平”的宏伟宫殿群,构成了城市天际线的巅峰——更能体现出皇权至上的威懾感。

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。这里,我想谈一点很少为人们提到的中轴线问题以及城市平面“九、五”数字和“龟鼎”的内涵。

规划融入民俗人文思想——以杨兴村门定位宫城广阳门,也就是城市的中轴线。

宇文恺规划大兴城,是综合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统一考虑的。不但利用地形、地势安排都城的功能,同时融入《周易》的哲理。并且,隋文帝极其重视的吉利地名和民间传说,也被组织到都城规划布局当中,甚至成为大兴城中轴线的定位基准。

杨兴村门定位中轴线:

《太平广记·西京记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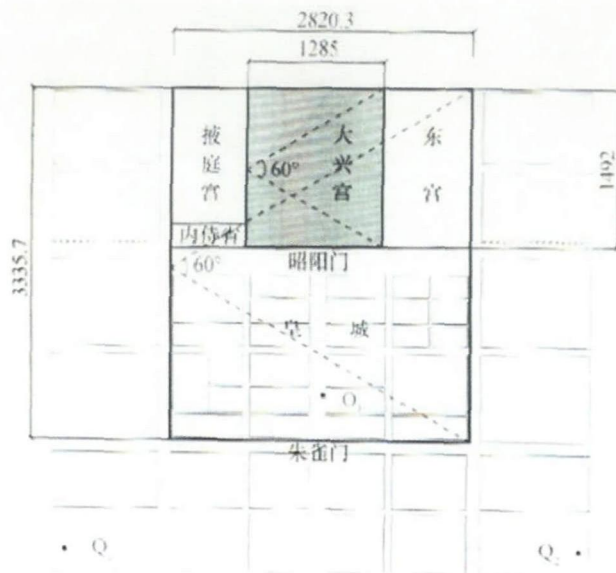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隋大兴宫城与皇城内涵等边三角形
(摘自《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》)

“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,大树(指大槐树)今见在。初,周代僧柁言多验。时村人于此树下集,柁来逐之曰:‘此天子坐处,汝等何故居此!’及隋文帝即位,便有迁都意”。“杨兴村”的名称,对于隋文帝杨坚来说,是“杨氏兴旺”的吉兆;何况还有周代僧人预言这里是天子驻地的传说。所以隋文帝定都在这里,而且借“杨兴”的村名,宫城就叫“大兴宫”,正殿就叫“大兴殿”,京城就叫“大兴城”。宇文恺确定大兴城的中轴线——也就是宫城的中轴线,就是以杨兴村村门作为定位的基准。宫城正面的大门——广阳门(唐改承天门)就安排在杨兴村村门的位置。唐人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记载:“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,唐兴村隋曰‘杨兴村’,唐时改之”;《太平广记》记载“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”,看来,大兴宫群臣等候上朝待漏的朝堂,大概在承天门口附近。从规划定位讲,宇文恺应该是以杨兴村村门作为广阳门的位置。而且大槐树大约是在村门前的旁边,宇文恺在规划中予以保留,到唐朝时期一直存在。这棵古树的保留,不但有历史文化的内涵,而且有生态景观的意义,中国古代这种不仅因地制宜,而且融合自然于人居环境,并尊重生态和历史文化的规划理念,是非常可贵的。

意识形态的中轴不是几何中轴:

以杨兴村口为准,定宫城与皇城的中轴子午线,直抵南山群峰沟谷之间,其相对的一个,命名“子午谷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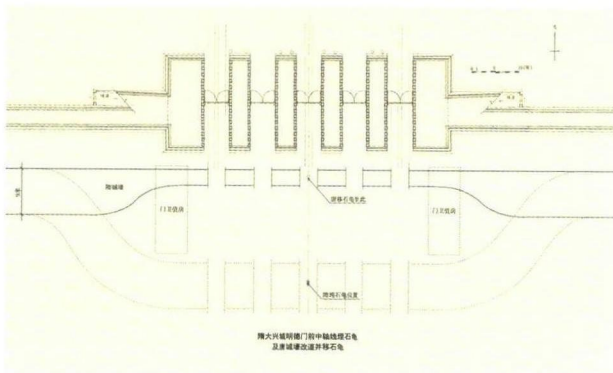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唐长安城明德门墩台复原平面图

宫城的中轴子午线，也就是皇城以及整个城市的中轴线。但是这条中轴线并非严格的几何中轴，它根据礼制思想的内涵，有所调整。田野考古探查结果，得知隋宫城广阳门不居中，而是偏西百余米。广阳门距东宫墙约1480米，距西宫墙约1350.60米，^②这一直不为人们所理解，这么大的差距，绝非施工的误差。

可以做如下验证：

广阳门中轴距大兴宫西墙为642.50米，距东墙也应相等，则大兴宫东西宽度为642.50米的两倍——1285米。实测宫城总宽为2820.30米，则掖庭宫宽度为总宽减去大兴宫宽，即702.50米。宫城宽减去大兴宫和掖庭宫宽度，就是东宫的宽度——832.80米。^③这就知道东宫比掖庭宽出约130.30米。上面谈到广阳门距东、西宫墙的距离，二者之差为129.40米，与130.30米相差无几，这只是测量的误差。从两方面核对的结果，可以确认宫城中轴线偏西130米左右。

中轴线偏西，是由于大兴宫左右的东宫和掖庭宫在制度上不能等宽——掖庭低于太子东宫，而造成的。认识这个问题，要从施工程序入手。隋建设大兴都城，是先建宫城，后建皇城，再建郭城。

以规划图确定的皇城为郭城的1/9，宫城为皇城的1/5；每城图形都是内涵鼎足的矩形。先以宫城落实到杨兴村，宫门广阳门重合杨兴村门；宫城左右再建东宫和掖庭——定位偏西约130米的中轴线。然后建南面皇城，再建外围郭城，一直都是这条偏西的中轴线了。

一、体现“九五之尊”思想的规划数据

大兴规划同时存在九与五的倍数：郭城是皇城的九

倍，皇城是宫城（大兴宫）的五倍，以体现“九五之尊”。大兴城的总体规划，是在一个内涵鼎足的横长矩形内，取九宫格的一份；将这一份仍然内涵鼎足的横长矩形竖摆在总体的北边中间作为皇城；皇城内的后部居中竖摆内涵鼎足的大兴宫；其左设太子东宫，其右设掖庭宫；东宫略宽于掖庭，以体现太子的尊贵地位。沿皇城中轴线开路，直抵南城墙，设都城的正门——太阳门（明德门）；在相对皇城东、西墙外侧，开路直通南墙太阳门左右，各设一门——启夏门与安化门，形成南城墙的“三门”（《考工记》所谓“旁三门”——四旁各三门）。在皇城前设横街，延至东、西城墙，分别设春明门与金光门——作为东、西城墙的中间城门；于其左右各开一门——通化门与延兴门，形成东、西城墙各“三门”。北城墙以外为禁苑，不许百姓进入。所以不取“三门”之制，仅在偏西端开有禁苑的南门——光化门，可能还有宫城西邻的华林门（唐改称“芳林门”），形式上似乎是都城的北门。

《长安志》引《隋三礼图》说，大兴城里坊的布置数目，是暗含月份和四季等涵义：宫城与皇城东西两侧各个十二“里”，是象征十二个月；皇城之南竖向四排“里”，是象征四季；四排的九列，象征《周礼》王城九逵之制。

郭城总体，除去皇城，用街道划分为网格。在网格中筑围墙，形成里坊和市。

二、内涵“定鼎”思想的几何图形

2009年初，我作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会理事长，为了奖掖年轻人业务上进，曾发起“中国建筑史学全国青年学者优秀学术论文”的评奖活动。王树声的论文《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》提出唐长安（隋大兴）的宫城、皇城和郭城的矩形中都内涵等边三角形的规律性（图1、图2）。我认为这一发现是对研究现状的一个突破，遂推荐作为“优秀论文一等奖”的第一名，得到通过。^④

王树声曾就发现唐长安城内涵三角形问题请教规划专家吴良镛教授，得到认可，但未能答复其涵义。王树声就等边三角形有何意义问题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解答：等边三角形的涵义是“鼎足”。

大兴郭城为内涵等边三角形的横长矩形；皇城是内涵等边三角形的竖长矩形；宫城（大兴宫）也是内涵等边三角形的竖长矩形。等边三角形为鼎足的几何

图形,以其纳入规划,借以表达“鼎立”、“定鼎”的思想。中国自从第一王朝“夏铸九鼎”以来,“鼎”已成为政权的象征。夺取政权谓之“问鼎”,而将建国谓之“定鼎”。同样是宇文恺规划的隋东都洛阳,其中轴南端的郭城正门,就称做“定鼎门”。

三、城市中轴前端埋置石龟寓意“龟鼎”——“皇权永祚”

大兴城中轴线南端明德门的中间门道以南4.50米处遗存石雕乌龟一件,它被埋置在废弃水渠口部的填土之中。石龟长1.03米、宽0.65米、高0.33米,造型与龟趺碑座相同,只是没有立碑的槽卯,显然是独立使用的专门雕刻。^⑤石龟被压在唐代路土之下,位置正在明德门南北中轴线上,石龟下垫有砖基础,并有开元铜钱,证明是蓄意安置的。考古地层揭示,石龟是水渠废弃后安置的。石龟头部向南,前高后低,亦即头部一端上翘,与唐代路面略平,以致头顶被当时车马行人践踏所磨损。田野工作人员断为唐朝遗物。

明德门隋时又称“太阳门”,是大兴城中轴干道——朱雀门大街,最南端的标志,大兴城的正面大门。它坐落在“九五”的南坡下,由于地势低洼。每逢雨季连续降雨,地面泄洪由南而北,致使明德门前一带常遭水淹。严重时,位于高地的明德门里也有积水。例如“元和八年(813年)六月庚壬,京师大水,风雨毁屋扬瓦,人多压死者;水积于城南,深数丈余,入明德门犹渐车辐。”^⑥由于明德门外的水患,迫使对城门前这一段的渠道的排水功能予以改进。

根据遗迹现象得知:隋建城时,城壕宽9米,明德门前一段为便于架桥而减至3米;门前的城壕距门3米多,东西直线走向。推测唐时鉴于排水不利,而将门前的这段城壕改道,向南湾出并加宽,而将原来城壕填埋。城壕改道南湾位置,原来有隋时埋置的石龟,唐改道时将石龟移至填埋的城壕处,所以发掘石龟位于唐地层(图3)。这里埋石龟,或被解释为是镇水厌胜,其实镇水常用牛,而不是龟。^⑦

从门前的隋城壕与两侧值房相叠压可知,隋时此处无值房,这东西两座值房为唐建,隋值房情况不明。唐改造后的明德门前一带,不仅因展宽城壕而改善了排水,而且由于城壕南移,也扩大了门前场地。使得长安东、西城来往出入城门时,避免两次过桥的不便。

宇文恺规划大兴城内涵深刻的哲理,宫城、皇城、郭城都内涵寓意鼎足的等边三角形,其目的在于表达“定鼎”——取得天下的意思。同时在都城中轴线南端明德门前护城河的桥南埋置象征长寿的石龟,共成“龟鼎”而突出“皇权永祚”的思想。

注 释:

①陈寅恪.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[M](二).礼义·附:都城建筑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.

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.唐代长安考古记略[J].考古1963年第11期。报道了朱雀门距东、西皇城墙的距离,也就是隋宫城广阳门距东西宫墙的距离

③杨鸿勋.关于唐长安东宫范围问题的研讨.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[M].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8年.

④王树声.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.杨鸿勋主编.建筑历史与理论第十辑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9年11月.

⑤石龟造型极其质朴,现在没有隋朝石龟的参照,尚难断代。已知唐朝石龟,例如2004年西安市莲湖路曾出土《大唐重修内侍省碑记》的唐掖庭宫门前一带,出土了一个石碑的龟座,即所谓的“鼉质”(或名“霸下”),但此件不是龙头,造型很像明德门出土的石龟,只是有立碑的大卯口。唐朝石龟除碑座外,独立的石龟雕刻,有初唐李寿(神通)墓出土的雕工精致、背刻墓志的石龟,其造型与明德门前出土的石龟类似。这个初唐石龟应该是隋高级工匠所作。看来,这件石龟很可能是隋朝遗物。

⑥《唐会要》[M]卷四四,“杂灾变”。

⑦发掘简报记述:“在城门南侧距各门道口3米多,有东西向与城门平行的填土沟一道。沟宽3米,由唐代地面向下深1.80米,经钻探沟长43米。再向外,其东端有房址,西端已近现代路沟,未能探得。我们这次只在中部发掘了长5米的一段。沟的口部被压在唐晚期路面下,沟的两壁很直,无坡度。在沟底有很多乱砖,其中印有纪年文字的砖十八块。印文为‘西坊开廿八九月官砖’(六块),及‘西坊开廿八官砖’(十二块)两种。从沟壁之直、并无坍塌的情况来看,这些砖很可能是沟壁的包砖,因而破坏后尚残留在沟底。但是在发掘的一段中,并未发现砌砖的痕迹。沟底不平,在坑凹处有淤土并发现有蛤壳。此外,沟内的填土较纯,只有少量的瓦片和陶器残片。”看来隋时此壕沟壁没有包砖,唐砖是填壕时混入的。在明德门前埋此石龟,或推测为镇水厌胜,但是历来以牛镇水厌胜,未见有用龟者。

作者简介:

杨鸿勋(1931—),男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,研究方向:建筑考古学、建筑历史与理论。

(责任编辑:崔勇)